



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
民国文献丛刊

刘汝明 著

劉汝明回憶錄

原名：一个行伍军人的回忆

中華書局



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
民国文献丛刊

刘汝明 著

刘汝明回忆录

原名：一个行伍军人的回忆

中华书局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刘汝明回忆录/刘汝明著. —北京:中华书局,2014. 8
(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文献丛刊)
ISBN 978-7-101-10178-2

I. 刘… II. 刘… III. 刘汝明(1895~1975) - 回忆录
IV. K825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105253 号

-
- | | |
|-------|---|
| 书 名 | 刘汝明回忆录 |
| 著 者 | 刘汝明 |
| 丛 书 名 |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文献丛刊 |
| 责任编辑 | 张荣国 |
| 出版发行 | 中华书局
(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)
http://www.zhbc.com.cn
E-mail:zhbc@zhbc.com.cn |
| 印 刷 |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|
| 版 次 | 2014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
2014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|
| 规 格 | 开本/920×1250 毫米 1/32
印张 11 插页 2 字数 140 千字 |
| 印 数 | 1-4000 册 |
| 国际书号 | ISBN 978-7-101-10178-2 |
| 定 价 | 46.00 元 |
-

自序

一九六四年七七抗战纪念日之前，每年执笔写纪念文的秦绍文（德纯）兄逝世不久，我见到前二十九军的老朋友们已凋落殆尽，一时伤感便写了《七七抗战与廿九军》一文，投寄到《传记文学》杂志。原以为必如石沉大海，不料竟蒙刊载，而且引起了主编先生的兴趣，亲来舍下访问，表示希望我能继续写一些回忆类的文章在《传记文学》连载发表。当时实在不敢答应，我是一个出身贫寒自幼失学的人，长大后虽也曾攻读过一些经、史、兵书之类，但执笔为文究非所长，所以便婉言辞谢。哪知主编先生锲而不舍，接连来了几次，并且鼓励我说：“写这类文章主要是记出自己所经历过的一些事实，给后来治史的人多些材料，不同于写一般的文章，需要什么舞文弄墨，同时你一生戎马，经验教训必多，写些出来也可使年青人能有个借鉴。”他这样一说又激起了我的豪情，便想：“我一生军伍，几十年来虽不曾经历过十分大

事，但所见所闻确也不少，有些事觉得社会上一般的传说，以讹传讹，确乎是距离事实太远，我应该把我知道的真象据实写出来，至于信不信那就完全由人去了。其次我想到《传记文学》提倡‘知识是经验的累积’，我当然谈不上什么高深的知识，但经验总还有点，写出来不敢说请人借鉴，供人家参考参考总是可以的。”想到这里便答应下来写写试试。

因为一向没有写回忆录的准备，故而没保存下什么资料，所以多半是靠记忆所及，少数的翻阅翻阅别的文件，有些地方记忆已有些模糊不清难于查证，但我也总力求真实，不敢臆测编造。同时写自传总也难免有自我吹嘘之嫌，这点在开始写的时候便也决定，为了存真，“光荣露脸”的要写，“丢人现眼”的也要写。因为光荣的、好的不说出来无以对我的长官、朋友，特别是那些流血流汗的部属。坏的、失败的不说出来不足警惕，而且人非圣贤孰能无过，我一生自也难免犯有不少的错误过失，只要不是有心为恶，也就不能算作什么真正“丢人”。

有人说写历史是越近越难写，因为时代近了牵扯的时人也就增多，我自然也不例外。原打算写到十九年为止，但主编先生又一再敦促，故继续写到三十八年，虽力求避免涉及旁人，但由于我的文笔生涩，有些地方仍难免辞不达意，更兼难免也有见仁见智的看法不同，所以如果有开罪朋友的地方，只好统请海涵一二了。

刘汝明 一九六六年七月七日于台北

目 录

自序/1

入伍/1

打白狼/11

川陕道上/21

不光荣的作战/28

“二陈汤”/34

马厂誓师/41

武穴主和/46

常德整军/51

关外行/54

二次入陕/63

一次直奉战争/71

南苑练兵/75
首都革命/84
“摄阁”与驱逐废帝出宫/91
国父北上/97
直奉“分而复合”/103
南口之战/111
五原誓师/123
西安解围/129
出师潼关/136
兰封战役与徐州会战/148
红枪会/154
北伐告成/157
编遣会议/162
晋祠行/174
困兽之斗/179
渡河入晋/188
大刀队扬威长城/192
七七事变/194
挑拨离间/199
张家口战役/201
难忘的教训/209

转进、改编、腾谤/213
敌后两面作战/217
瓦子口击敌/221
斫丧精锐/224
再失良佐/230
一面作战一面整训/232
重庆去来/236
豫西之战/241
许昌受降/247
裁军调处/251
改编作战/254
放弃开封/265
谣言止于智者/271
共党的统战/278
和谈与江防/285
奉令转进/290
衷心的抉择/296
最后的战斗/301
海上归休/307
附录：七七抗战与廿九军/310

入 伍

民国元年元月，我怀中带了两个饊子（北方一种小米绿豆混合面做的食物），离开我居住了十七年的家乡，要去邻县景州投军。

当我向母亲叩别时，母亲噙着眼泪，仍不停的摇转她手中的纺车，低着头，默无一语。姐姐哽咽着，领着尚天真无邪的妹妹和弟弟，送我出来。走到门口，姐姐不禁嚎啕痛哭，我强忍着酸楚，放开脚步，一口气跑出了村外，从此我便走上了四十年军队生活的第一步。

从军以来，我自然也历尽艰苦，后来微幸也能开府建节。假使有人为我写传，一定会说我“幼怀大志，投笔从戎”等等。其实不是，全然不是，我不过为了求取一个职业，用来减轻母亲的负担，并希望进而能养亲抚幼而已。

我祖居河北省献县抛庄，世代务农，本来也不过是一个中等以下的人家。更由于子孙蕃衍，财产不断的分散，传

到祖父这一代，我家不过仅有薄田五亩，土屋三间，所幸父亲懂一些中医，为人看看病，家用也不无小补。后来父亲听了人家的劝告，到关外去求发展，哪知去了不久，便病逝在哈尔滨。这年我十三岁，姐姐十六岁，妹妹十岁，弟弟汝珍还是呱呱在抱。

父亲逝世，使家庭生活更加困难，母亲含辛茹苦，带着姐姐纺纱织布，上侍年近七十的祖父，下养我们这几个孩子，就这样刻苦坚贞的度着岁月。

那时北方乡间风气未开，教育落后，还没有学堂，我们村子里有一间义学，由族中刘连璧老先生任教，我也跟着念了些四书五经。不过这时科举已经停止，大家都认为念私塾的人毫无出路。母亲有意送我进生意家当学徒，我的性情又太不接近此道，无可奈何，便只好决定当兵。如今想来，一个人的一生，上苍都有着一一定的安排。设如那时科举不废，我也许去努力念八股考个秀才。设如家里仍有些田产，我也许终老乡里做一世农夫，偏偏是此路不行，彼路不通。终于使我换上军装，做了一辈子的职业军人。

我在决定投军当兵以前，对于我要参加的那个团体还是一无所知。事实上我也没有选择的知识与能力，只知道在距本村九十里之景州塔，有人招新兵，而我要当新兵就是了。及至报了名以后，才知道我参加的部队是陆建章新成立的“左路备补军”。我被分到二营前哨，哨官叫刘子宾，营

管带就是以后的风云人物冯玉祥氏。

入伍不久，刘哨官知道我读过书认识字，便想叫我去当“文案”。“文案”一职有大有小，在高级衙门中，“文案”要很有学问的人来充任，地位也很崇高，一般的主官要称呼“文案”为老夫子。可是一个哨（等于现在的步兵连）的“文案”则不过是造个花名册，写个普通公文而已。我想既然当了兵便应该一刀一枪的博个正途出身，不愿意当这个“文案”，便向刘哨官苦苦要求改为列兵。不久管带（营长）知道了，叫我去问了问，便和刘哨官商量，把我改为第五棚的“什长”。顾名思义“什长”是十人之长，换言之就是我当了现在的步兵班长。可是我这个“什长”不会下操，刘哨官叫我晚上跟排长学，白天再去教新兵，因此我常常独自练习到深夜。现在有时在报上看到“恶性补习”的名词，不由得哑然失笑，想想我当“什长”时的情景，该也算是恶性补习了吧。

新兵招足在北苑训练，一日陆将军（建章）来点名，点到了我时，我背诵我的籍贯、年龄、箕斗。陆将军责问的说：

“十七岁的小孩子，怎么能当什长？”管带冯先生在旁边告诉他我念过书，识得字。陆点点头便走过去。我念的书实在微不足道，但是在那个时代里，竟还成了“人才”！当时的北方，教育并不普及，尤其是农间念过书的实在是凤毛麟角。和我同哨入伍的，仅有佟麟阁、过之纲等二三人识字。

即使军官当中，也只有中哨哨长（排长）李鸣钟学术两科比较尚好，我跟着他练习，获益不少。

不久管带冯先生，开始对全营精神讲话，我记得他第一次讲的是“孝顺父母”，第二次讲的是“爱民”，第三次讲的“普法战役”中，德国人的爱国故事，大意是一个德国人叫德来斯，为了要知道法国人一种新式步枪的制造方法，如何的牺牲性命，去把这造枪的方法窃回来。故事是他编的，还是确有其事，我不知道，只是他洪亮的声音，通俗的口才，把这个故事的精神，深深的打入我的心里。我开始觉得“当兵”的意义，不仅是要“找一个职业”那么简单的。

“左路备补军”是袁世凯在辛亥革命之后，他窃据了大总统，新成立的部队，并不是和“北洋六镇”一样的正式陆军，所以编制也承袭了满清时“巡防营”那一套，一共有五个营，每营管辖五个哨，哨就是连，连长叫哨官，分为中、前、左、右、后。当时的五个哨官中哨是吴耀堂，前哨是刘子宾，左哨是邹心镜，右哨是虞振滨，后哨是康子实。哨辖三排，排长叫哨长，排辖三棚，每棚有什长就是班长，我就是二营前哨第五棚的什长。孙良诚在左哨当什长，石友三、曹福林是左哨的新兵。

陆建章在清末时是袁世凯的执法营务处处长，民国成立以后改为军政执法处处长，“左路备补军”由他成立，由他指挥。全军的干部，有很多是由他原来的卫队营中挑选

来的。第一营营长是他的长子陆承武，陆承武是日本留学生，与徐树铮同学。宋哲元就是由陆的卫队营中挑到第一营去当哨长的。

冯玉祥和陆建章也沾一点亲戚，冯夫人是陆夫人的同宗侄女，她们是河北省盐山县尚家宅人，姓刘。后来冯夫人故去，冯才又续娶的李德全。

清末宣统三年，冯本来在陆军第二十镇八十标（团）三营当营长，二十镇的统制（师长）是张绍曾。辛亥革命武昌起义之后，冯和一营营长施从云，二营营长王金铭密谋响应。他们并劝说张绍曾，请张参加。张表面答应，内心很有顾虑，正谈话间，张以试骑新马为由竟飞驰而去，冯也不容分说，跃马即追，一追四十里，才把张追到。正在此时，巡防营有个统领叫王怀庆，假做同意参加革命，请他们三个营长去开会，冯因为去追张绍曾，由营附代表参加，不意竟被王怀庆扣留，把施、王及那个营附都枪决了。冯也被通缉。后来革命成功，冯才投奔陆建章，由陆委任他当“左路备补军”的二营管带。因为这段渊源，所以由二十镇来找冯先生的人很多，像前面提到过的李鸣钟就是一个，到民元四五月间，来的更多，现在记得的有韩复榘、谷良民、谷良友、张维玺、许祥云等人，韩复榘和我一样也是先到后哨当“文案”，后来改为什长。

我们的服装很好，黄色的军衣，所以人家都叫我们黄

马褂子，武器则比较羸陋，使用的是双筒毛瑟步枪和单筒毛瑟步枪两种，每哨有九十枝这种枪，没有自动武器，也没有炮。

最早我们是在北京城北的北苑训练，在训练过程中，第二营表现的最好，陆建章屡次到北苑来看各营的单人教练和班教练，讲评都是以二营为第一。派人来考“士兵须知”，结果也是第二营第一。营部编了一本《军人精神书》和几支军歌如战斗动作歌、射击军纪歌、站岗歌等等……是把士兵在战场上和服各种勤务时，应该知道的各种注意事项用极通俗的词句编成歌，教兵演唱。这样对一般知识较低的弟兄，很容易就把这些事情，深印在他们的脑子里，比较让士兵苦记条文要容易收效的多。

不久上面来校阅，记得是由蒋百里（方震）先生带领来的，校阅的结果又是二营得第一。后来陆建章亲自来看营教练，以及分列式、阅兵式等。二营动作整齐迅速，陆很满意，在讲评时，自然又对二营称赞一番。

我们这一营，连得这么多好评，大大的招人嫉妒。陆建章当过山东曹州镇总兵，有一批在曹州跟他的老人，尤其对我们二营不满。有一位第五营管带，外号叫王白毛，他发起了一个“不识字会”，三、四、五营的人参加的很多。他们以为二营之所以出风头，主要是有些识字的人。他们组织“不识字会”，便是含着自别于“识字”的意思。后来被陆

建章知道了，把王白毛他们找去大骂了一顿说：“你们成立了一个‘不识字会’，来排斥识字的人，这不是连我也排斥在内。”王等挨了骂，回去才把“不识字会”解散。

冯先生练兵也很注重体育，记得有一次“左路备补军”在黄寺开了个运动会，大多数的奖品，又都被我们得来，这自然更使别的营怀恨。

后来我们二营开到北京以西三十多里的三家店去，任务是看守火药库。训练依然不懈，每日加紧练习打野外、战斗各种动作，什长以上的每天还要加一个小时的图上战术。冯自己也注意到一般学识的重要，特别请了一位许仙浦先生，教他自己几何、代数，同时教我们算术。

冯的学问并不好，可是他很努力进修，也很注意我们的补习，所以一直到后来，经常都从外面请人来教历史，教数学，不但军官要上课，军眷也要上课。

民国初年的军人待遇，不算很高，但是物价低廉，所以也就很富裕，一个列兵每月可有四两多银子的饷，什长每月有五六两之多。那时还没有“粮饷划分”之说，伙食也由饷里出。当时物价一袋洋面不过一块多钱，一块钱可以买一百几十个鸡蛋，或者是七八只老母鸡。河北省因为人口稠密，地价每较昂贵，但是上好的良田也不过四五十两银子一亩，稍差的一二十两也就够了。

我在军中的生活非常节省，本来我没有什么嗜好，

直至目前还是不动烟酒。同营的弟兄也多是农家子弟，没有“营混子”，风气非常淳朴，除了伙食之外，一文钱都用不着，不到三个月，我已积存了十多块大洋。我把这些钱托人带回家去，并且写信禀告母亲不要太劳累。当这钱带走时，我心里的欣悦是无法形容的，我觉得我已是个成人，家庭生活的担子，我已可以负起。后来听说母亲收到这笔钱，仍然和从前一样，每日从朝至暮的纺纱织布，把这钱存起来。以后我陆续的往家带钱，母亲开始买地，能买一亩买一亩，能买两亩买两亩。一直到民国五年，家里又买了十几亩地，请了一个长工，生活进到了小康情形。

中国农间的所谓“地主”，在共党口中都说成了“穷凶恶极”的“剥削阶级”。当然为富不仁刻薄成家的也有，但绝大多数都是克勤克俭，一点一滴的积攒起来的财富。有的人有了钱仍然是勤俭持家，所以也能保持几代的小康之家。以我家而论，当初的穷是由于我们社会的承袭制度，不断的分家，财产不断的分散，传到了祖父这一代，便只剩了五亩地，并没有什么人剥削我们。而我祖孙、母子、姐弟省吃俭用，点点滴滴的又积攒起来一些田产，也绝未剥削过别人。自七七抗战以后，我的家乡便为共党盘据，共党以一个为我照料田产的堂叔为对象，开始“清算斗争”。我这个堂叔无辜被他们逼得上了吊，为首之人是别族中的一个晚辈，他好吃懒做，整日游手好闲，把上一代传给他的几十亩

地都挥霍得一干二净。共党嘛使他出来说他是被剥削的人，可是他的钱是他自己花光的，怎么能说是别人剥削的呢？这些都是后话，暂且不提。

不久“左路备补军”训练完成，便开进北京担任勤务，原驻北京拱卫京师的是曹锟第三师卢永祥旅唐天喜团，他们开出了北京，城防以及若干重要机关，便由我们接防。我们这个哨住东城外交大楼，每天我都要带着弟兄在大门口站卫兵。外交大楼是政府中枢所在，每日出入的高级官员甚多，都坐着很讲究的大马车。出入之时我自然要喊口令“立正，敬礼”。袁世凯也常来，他坐着一辆双马拉的马车，出入之时都要“净街”。国父孙中山先生和黄克强先生到北京时也到外交大楼来过，我还是站卫兵时，第一次瞻仰到这两位开国伟人的风采。

在这条街上有一个“相面”的，一天我下了岗，开玩笑似的找他去相面。他端详了我半天说：“老总（北方一般人对当兵的称呼），别瞧您今天在这大门口站岗，二十年后您也会坐着马车，进出这个大门的。”

他在这附近相面，自然可能认得我，这种顺口的江湖话，多半是奉承我。我也就打趣的说：“好，真有那一天，我一定请你的客。”我一生不信“卜筮星相”，所以并没有把这话当意。一直到民国二十五年，我出任察哈尔省政府主席，并例兼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委员。一天坐汽车去开会时，大